

■新作聚焦

李修文长篇小说《猛虎下山》： 荒诞中的些许温情

□潘凯雄

还记得20年前的2003年初,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读到社里新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就是李修文的《捆绑上天堂》。沸腾的现代都市场景和活力洋溢的都市青年气息扑面而来,这在那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还真不多见。当时我还不认识修文,只是依稀记得宗仁发兄主编的那本颇具影响的《作家》杂志上有位名叫李修文的“特约策划”。说实话,那时我脑子里还真没有将这两个“李修文”画等号,老观念让我觉得能够干“策划”者当应是个“资深”的“老江湖”,而一旦“资深”恐也写不出《捆绑上天堂》那般青春飞扬的作品。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下的这个判断全错,只是那以后,修文就一头扎进散文写作和影视策划之中,虽有《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和《诗来见我》等特色卓著的散文相继面世并以此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长篇小说的创作则始终不见动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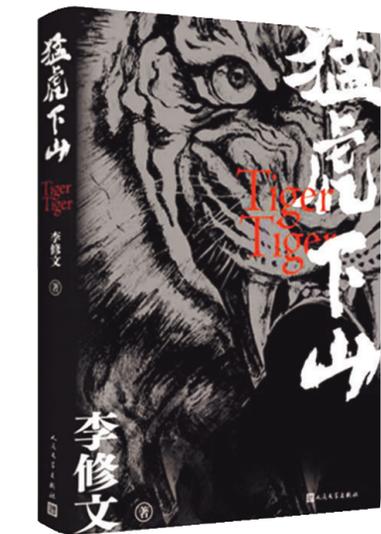
“上天堂”莫非真成了修文长篇小说写作的“天堂”?当本人这种疑问越来越强烈时,修文却冷不丁地来了部“气势汹汹”的《猛虎下山》,尽管篇幅不长,却果然是“猛虎”一只,虽虽是好看,却不太好对付。故事虽不复杂,但情节跌宕,读起来颇吸引人。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春夏之交,本该是桃花盛开的灿烂时光,某炼钢厂却笼罩在即将被一家沿海的特钢厂收购,一批工人面临下岗的忐忑不安之中。就在此时,传言毗邻厂区的山上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猛虎“叫停”了厂里的这个改革进程,“猛虎”万一下山该咋办?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于是,新厂长决定重赏招募打虎勇士,报名者可免除下岗;于是,一连串的不知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亦或是“闹剧”的故事渐次登台。

如果说为了工厂的稳定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在员工中招募打虎志愿者尚情有可原,但将其和与下岗挂钩这就有点意味了。

轧钢车间的刘丰收本就是那个不起眼的普通工人,而且还是个“窝囊”货,按寻常逻辑这次必在下岗之列。为了保住家中的饭碗,老婆林小莉便撺掇着他报名参加了打虎队。经过一夜流落室外的恐惧与荒唐,第二天逃回家中的他竟拔下自己头上40余根白发跑到厂长面前,谎称昨夜夜间在山上与老虎遭遇,而且那还是一只“吊睛白额虎”。正是由于这个无奈而大胆的谎言,在全厂大会上,刘丰收竟被厂长正式任命为打虎队队长,“享受班长级待遇,同时不再担任炉前工工作,如果打掉了老虎,厂里还将另行重用!”故事到此本就能够荒唐了,但戏码更足、更加荒唐的还在后面:与刘丰收本就有过节的脱轨车间副组长张红旗虽无下岗之虞,竟也主动申请加入打虎队,甘为刘丰收属下,并率先上演了一出“人扮虎”的大戏……此时,《老虎下山》所上演的戏码就从一般的喜剧进入荒唐进而走向极度的荒诞。

荒诞在文学的存在不足为奇,在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那里,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贝克特的



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被忽视、被淘汰乃至被掩埋的受困者确实是抱有鲜明的悲悯与温情的,只是这种悲悯与温情在作品中表现为强烈的戏谑直至推向荒诞



《猛虎下山》插图(《花城》2024年第1期)

《等待戈多》等为代表的荒诞派作品则更是以荒诞来集中揭示人类存在的种种异化。那么,李修文在《老虎下山》中如此大行荒诞之道,又是意欲何为?

因为可能有老虎而危及员工,厂里组建了打虎队以维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这很正常;又因为新厂长宣布积极报名参加打虎队的工人就可免除下岗失业之虞,所以老虎的存在就悄然转化成了工人们能否保住自己饭碗的重要条件。这个逻辑看似环环相扣,但将可能有老虎存在这个突发事件与推动企业现代化改革进程、促使企业健康发展的正常工作如此挂钩不仅毫无道理,本质上也是荒唐的。而这种荒唐逻辑一旦成为现实,接下来诸如“人扮虎”、打虎队成员间暗中的勾心斗角之类一串闹剧的上演,本质上就是这种荒唐逻辑的必然延伸,也是进一步将这场闹剧推向极端进入荒诞的重要推手。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怪圈,李修文得以凭借自己强大的艺术想象力与整体统筹力,为《猛虎下山》搭建起了一个严谨而快节奏的虚拟结构,一方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异化”与“荒诞”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刘丰收、马忠乃至张红旗等普通人,也是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着同情与悲悯。由此构成了《猛虎下山》于整体荒诞和严肃中,戏谑与温情并举的双重调性。

关于“荒诞与严肃”,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是《猛虎下山》最直观的外在形态。一部分职工面临下岗失去“饭碗”,这当然是一种严肃,特别是对那些技能平平者而言。但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阵痛

如果处理得柔性一点、科学一点,阵痛度自然也会随之降低一些。反之,简单粗暴地处理,将下岗与否和是否自愿上山以及能否成功打虎挂钩,那就不是严肃,更是走向荒诞了,因为这里毕竟就有以生命为代价的巨大可能。当然,我也相信这未必就是生活中的真实,但面对生活中已然出现的种种不公与严肃,文艺创作将其推向极端既是艺术处理的一种正常方式,也是有责任感作家的职责所在——非危言耸听而是旨在唤醒良知。

关于戏谑与温情,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被忽视、被淘汰乃至被掩埋的受困者确实是抱有鲜明的悲悯与温情的,只是这种悲悯与温情在作品中表现为强烈的戏谑直至推向荒诞。如果说这一点尚不能为读者所理解,那我只能归咎于修文在此处的着墨稍猛了一点,这显然不是面对现实生活态度的非问题,而是艺术处理的分寸问题。也正是因为修文创作时的这种悲悯情怀,我想读者在读到刘丰收、马忠乃至张红旗等角色上山打虎的种种疯狂与愚昧时,感受到的一定是笼罩在巨大荒诞感下些许的辛酸与悲凉,而这样一种审美效果则恰是修文自身悲悯心所带来的力量。

概括起来,《猛虎下山》展现出李修文面对生活现实时是如何施展艺术想象的才华,从而演绎出了一则世相与人心的寓言。在虚拟的声声虎啸中,人性的本能与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缠斗与和解,莫不一一被残酷地撕裂开来,给读者留下宽广的想象与深思。(作者系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

■评论

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达过,中篇小说是百年中国水平最高的小说文体。进入新时期在大型刊物推动下的中篇小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中篇小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体。中篇小说创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的容量和传达的社会与文学信息,使它它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当社会转型、消费文化兴起之后,大型文学期刊顽强的文学坚持,使中篇小说生产与流播受到的冲击降低为最小限度。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经济至上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使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文学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很像一个当代文学的“活化石”,一直没有改变它文学性的基本性质。因此,百年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它们在诚实地寻找文学性的同时,也没有影响其对现实介入的诚恳和热情。无论如何,百年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水平,它所表达的不同阶段的理想、焦虑、矛盾、彷徨、欲望或不确定性,都密切地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于是,一个文体就这样和百年中国建立了如影随形的关系。它的全部经验已经成为我们值得珍惜的文学财富。

杨晓升是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一段时期以来,他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两副笔墨上下翻飞,他的敏锐和尖锐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敢于直面现实,敢于触及问题和进行批判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龙头香》,是我非常喜欢、也曾极力举荐的一部作品。小说在日常生活习焉不察的“烧香”行为中,发现了巨大的秘密。烧香的确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但王家烧“龙头香”还不一样,“父亲和母亲始终认为,父亲之所以能从一个农民家庭走进京城,奋斗到如今的副部级干部,除了他自己的努力,考上京城名校,毕业后留在京城工作,以及后来岳父也即我姥爷的适时扶持,更大的原因是与我爷爷和奶奶不断为他烧香拜佛,保佑他平安健康、升官发财密不可分”。对许多人而言,烧香拜佛只是为了娶妻生子、升官发财、避祸免灾、祈求平安等实用主义的诉求。王兴一家关于“烧龙头香”的价值观,是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在结构上是线性叙事,以社科院研究员王兴赴真山替父烧“龙头香”为线索,情节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情节反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时几乎没有任何破绽。我惊异于杨晓升对生活细枝末节的熟悉和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反映欲壑难填的世道人心的小说。作家通过最细微的生活现象,以一个最不引人瞩目的生活细节切入,让欲壑难填的世风和盘托出一览无余。人性中最致命的就是欲望无边。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兴可能更具代表性,他一方面警觉父亲的权力、母亲的贪欲、陈总的行贿,另一方面,他的警觉和抵抗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一介书生的百无一用真是不堪入目。倒是王兴返京乘坐出租车的那个年轻司机,在夸夸其谈中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他虽然不免炫耀和肤浅,但他随遇而安、遵纪守法,靠自己的诚实劳作过踏实的日子。他不信佛,但不反对别人信佛。因此他有着安稳和值得夸耀的生活。

小说写出了信仰的危机、文化信念的危机以及实用主义价值观、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危机。对此,杨晓升充满了忧患和焦虑,通过小说的人物、情节和细节,将当下世风中的问题暴露无遗。因此,这是一部极具文学性、敢于挥起批判之剑的小说,是一部敢于触及问题,对人性无边欲望深入揭示的小说。现代性从来就具有两面性——我们走进了现代性,也走进了现代性带来的不曾预料的问题和难题,因此我们就处在了现代性的危机之中。《龙头香》表达了对这一危机的深切忧虑,他的批判之剑锋利无比。《龙头香》在杨晓升的小说中只是一个个案,但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他的创作延续了报告文学对现实关怀的传统,这种关怀有时未必是宏大叙事的宏大叙事,更多的可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比如《买房记》中与高远飞一家的关系,“我”甚至要操办其父的丧事;这个“买房”的情节在短篇小说《过程》中也曾出现。可见“安居”才能乐业,但收入捉襟见肘的老秦,很快就打消了念头,直到即将退休时他才“雄心再起”,希望兼一份职多一份收入,实现他的买房梦。其他几篇如《新正如意》(我的朋友刘秘书)《无奈人生》等,都集中反映了杨晓升小说创作关怀现实的情怀和执着。

杨晓升是“60后”一代,代作家和“60后”一代作家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对生活的积极介入、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世风代变,但这个文学创作群体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没有改变,对文学执着的追求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在强调“变”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变”的重要。我曾读过晓升这样一段话:“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最大限度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去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吗?”这也是晓升不曾改变的文学追求。(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新作快评

胡性能中篇小说《去县城的路上》,《钟山》2024年第1期

暗示的意义

□张瑞洪

胡性能在《去县城的路上》中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恰当的暗示:一个将死之人被抬上殡仪馆的车,在去往县城的路上,看着病人脸上的瘡子,殡仪师回首往事,并愈发肯定这人正是当年差点将自己害死的恶徒。接下来,这一暗示变成了一种非常纯粹的指引,它指引我们去了解殡仪师如何受过去的经历所累,以至于在从业十余年后,依旧对县城充满了阴影。行文至此,小说已经被推向高潮,阿站靠着尸体,像“靠着一个刑具般的椅背”,随着河水的上涨,阿站不得不用石头砸烂老鲁的手指,最后挣脱绳索成功逃生。这个命悬一线的夜晚,使阿站与瘡子的紧张关系到达顶点。也正是在这里,小说开头的那么暗示被完成了,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由于我们只能从读起来、并且在十来年里处理过无数死者的殡仪师,会因为一个瘡子而感到恐惧。这是这篇小说中一次精彩的巧合,它为我们先前的预设找到了一个解释:原来真是冤家路窄,当年的受害者终于能够亲眼看着恶人死去。

正是这种恰当的暗示,使作者获得了叙事的出口,那些他想要抓住的人物,就这样从中涌现了出来。这很像一个先有结局、再有开始的故事,但由于我们只能从读起来,所以会为那些转折感到惊喜。我说的不是那种悬念,不是小说中常常被遮掩又被突然找出来的东西。在《去县城的路上》中,驱动这篇小说的,只能是文章前半部分的那种暗示,它非常坚固,让人觉得绕不开,必须顺着读下去才行。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设想一下,当作者绕开阿站对殡仪师上的病人

的种种猜测的话,这篇小说便不成立了。就像那颗瘡子,它在这篇小说中必须出现两次,或者说至少两次,才能让我们感受到阿站内心的恐惧。很难说瘡子是为恶人而造,但在这篇小说中,它确实将全文稳定在了一种逻辑当中。

《去县城的路上》更像一篇心理小说。胡性能多线并置,使整个文本出现了两个时空体,一个在讲述“去往县城的路上”,另一个则在解释“为何要离开县城”,一里一外,彼此照应。殡仪师的人生前史,全由他的内心来告诉,我们获得的关于阿站的完整印象,也同样来自他自己的心声。但有意思的是,这篇心理小说考虑了“存在”,考虑了生活当中所谓的“真实的可能性”,于是当我们在获得了关于时间的另一种感觉的同时,这篇小说也让我们提前回到现实中来。

小说的最后部分,当阿站已经消退了恨意,病人将垂落的手搭在自己腕上时,一声意外的称呼却打破了他的内心活动。前来护送的家属喊出:“到啦到啦!妈,你醒醒!妈,咱回家啦!”小说到这里,突然迎来转折,原来作者不过是移花接木,在最后的段落才指出这篇小说起源于一次误解。

现代小说发展到今天,几乎总是在要求我们如何去“相信”,但是现实不同,我们似乎从未抽身,于是所有可能性都变得非常合理。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在《去县城的路上》也许并不算一种悬念,它是在所有解释都能够自圆其说之后,小说对悬念的一种扭转。

我们理解了小说的暗示,从美学力量上来说,它完成了,但小说依然没有停止。就好像一个物体,它在被举高以后,便获得了重力势能,可以下落,也可以继续上升,这取决于它的惯性。在一篇小说当中,如果用担心它意识到了这种惯性,那么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它会如何结束。(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评论

从个体生命的故事展现大时代的侧影

□张颐武

覃亚四先生已经于1993年去世,他的遗作《江汉春风起》在他去世30年后出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也从中透视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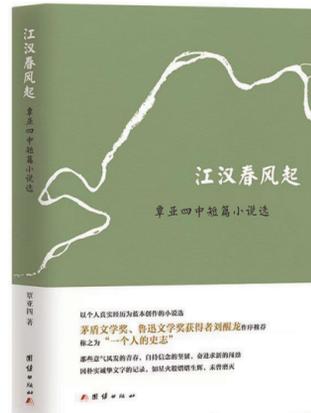
这是一位并不为人所知的作者,他写出的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并难以忘怀的故事,他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它们会有被我们看到的时机。这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他的故事并没有多少传奇性,也和生活在当时的普通人的经历并没有多少大的差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用质朴的语言、平实的叙述呈现出的他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那些过往,却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和这个国家一起走过了艰难奋斗历程的个体自我陈述,惟其平淡,却更显岁月本真;惟其随意,却让人浮想联翩。他在为我们打开一个平凡的世界,展现一个人真实经历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个大时代的真实面貌,使得他的那些看起来平淡的个人经历和似乎并不起眼的命运起伏,却又具有了见证大时代的那种真正不平凡的历史价值。

这里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部书的平实——踏实的细节描写,具体而微的生活刻画,白描式的平静叙述,让这部书有了一种代入感,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主人公的生活现场,和他一起面对当时的社会,和他一起经历着生活的点滴。天然去雕饰的自自然然的展开,让我们像在安静的午后听一位老者娓娓道来,跟随他先在部队又进工厂再下农村,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与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的形形色色迎面相遇。这里既有奋斗和努力,也有挫折和困扰;既有欢欣鼓舞,也有沉郁顿挫;既有生活中的小悲欢,也有时代变迁的大影响。这其中的真情实感,是作者精神世界的真实展开,是在他人生后期回首自己的精神体会,也是他穷其一生吐丝

成茧的精神财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大时代里坚持自己的人,一个努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的普通人的追求,而这追求正是他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用真实的笔触呈现出来的。那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中经历了成长、成熟和变化的个人,他从青年直到中年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真切命运和真实生活的忠实写照。这种生活的描摹带有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和记录的意味,只不过这是他对对自己生活的记录。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从广西到海南再到湖北的人生经历,都让人看到了那个时代“基层”社会的面貌。这个“基层”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们生活的形态,都被描述得异常细腻。偶尔的风趣和几笔诗意,让这个“基层”有了独特的意趣。故事里这个“基层”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平平常常,并没有多少巨大的波澜。但在当时靠集体力量改变中国的时代中,这个“基层”的日常生活,这些形形色色具体的小故事,都和社会的整体面貌有着实实在在的联结,那个时代“基层”生活的现实,往往并不为人们所深切地了解,尤其是一般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更难以被呈现。时至今日,这个“基层”早已远去甚至尘封,难寻踪影。而覃亚四先生所呈现的,正是这些难以被人们看到的东西。他从一个亲历者和普通人的角度展现了“基层”生活的林林总总,他用自己的讲述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的“大历史”提供了更多可能。

个人当然仅仅是历史的一个微小的部分,但来自“基层”的个人见证也不可缺少。在“冷战”时期寻求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努力之中,有一个平凡人的小历史的记忆,在承担艰难、奠定基础的时代里,有为国家不懈奋斗的一群普通人的故事,这其实也是那个大时代的深刻记



《江汉春风起》,覃亚四著,团结出版社,2023年1月

忆的一部分,它们不应该被遗忘。覃亚四先生从最“基层”提供了历史的真实记录,他的讲述涉及了时代风云、折射出时代沧桑,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发展的第一个三十年里人们的生存样态和国家的追寻,而他关于改革开放之初工厂变化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中国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中国正是在这样连续的过程中走向了新的历史。覃亚四先生从个人的视角所见证的一切,留下了风云变幻的大时代的一个侧影,也为当下的年轻人理解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难得的记录。

这部书写下来并得以出版,不仅仅是独属个人记忆的存留,而且是一个时代记忆的存留。这些故事既是个人历史的真实,也是一个大时代历史的真实,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和珍视的。(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